

古代中国与日本的“异域天学”： 七曜日与天宫图星占术

麦文彪

引言

所谓“天学”，也就是广义的天文学，指的是以天象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就古代中国而言，天学涵盖了天文、气象、时间的测量、历法、星占等不同的学术范畴。至于西方，直至16世纪，数理天文学与星占并无区分，同属“天文”，并被视为“博雅七艺”中的“四艺”(quadrivium)之一，其内容则主要以古希腊天文学为基础。历史上，古希腊天文学主要通过三个阶段传入东亚：(一)自东汉至北宋，佛教僧侣和丝路商旅把包含了希腊天文元素的印度天文学传入中国和日本；(二)元代和明初的回回学者翻译阿拉伯文的希腊星占和历法著作；(三)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译出当时欧洲的拉丁文天文学文献，其中包含不少以希腊天文学为基础的著作。本文便以七曜日和天宫图为例，尝试探讨历史时期特别是早期阶段古希腊天文学传入东亚的过程。

“异域天学”最初是怎样传入中国的？国内外学者在这一题目上均有不同的见解和论著，然而学界至今还没有完全勾画出整个过程。特别是文献方面，很多有关原典、版本和翻译的难题尚待厘清^①。自西汉“七曜五行，无

^① 现代学者当中最早关注这个题目的为伯希和(Paul Pelliot)和沙畹(É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特别是其1913年合著的文章《中国发现的一部摩尼教经典 II》(“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 II”, *Journal Asiatique*, 1913, pp. 99-199, 261-392)。其他涉及欧亚大陆天学发展、交流史和东渐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包括李约瑟(Needham, Joseph) *Science* (转下页)

不综达”的安世高，三国东吴“天文图纬，多所综涉”的康僧会，以至后秦“阴阳星算，莫不必尽”的鸠摩罗什^①，早期汉地的名僧多以天文知识渊博闻名。而我们对早期古代中国“异域天学”的认识，大多来自《摩登伽经》《大集经》《宿曜经》等汉译大乘佛典，以及《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等佛教史料。至于其他非佛教史料，除了瞿昙悉达的《九执历》外，正史只有零散记载。较早的比如《隋书》所载《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只记名目，内容无从知晓。不过，印度和中亚的天文学作为普及性和实用性甚高的学问，进入中国的年代应该不会比佛教传入中国晚。特别是往来海陆丝路的中亚和南亚游商与不同宗教和民族人士，在天学知识的传播上相信亦扮演着一定的角色。

一、七曜与星期概念的本源

星期、黄道十二宫和天宫图星占术，均源自古希腊，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不少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天文元素。早期的古希腊天文知识，主要通过源于印度的汉译佛典传播到东亚，而在传播的过程中又掺杂了不少印度和中亚的元素^②。由于印度天文学本身数千年来亦不断演变，其中多少是本土发展出来的，多少是外来的，至今学者尚在争论，特别是西方和印度学者在这一话题上存有颇大的分歧。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自公元前后至约6世纪，希腊天文学东传印度，并逐渐取代传统印度本土的吠陀天文学，这一点是不容存疑的。与此同时，新旧元素掺杂的印度天文学亦融入进去不同年代的梵语佛教文献。正因如此，自东汉到北宋的汉译佛典，给我们提

(接上页)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2,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351-357; 1959, Vol. 3, Mathematics and the Science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pp. 201-209, 汉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矢野道雄：《密教占星术》，东京：东京美术，1986年，第15—46页；何丙郁(Ho, Peng Yoke), *Chinese Mathematical Astrology: Reaching Out to the Star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 69-82; 江晓原：《天学真原》，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27—315页。有关汉地佛教天文学的发展概况，见 Eberhard, Wolfram, “Untersuchungen an Astronomischen Texten des chinesischen Tripitaka.” *Monumenta Serica*, 1940(5): 208-262; 钮卫星：《西望梵天》，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8—222页。

^① 《高僧传》，大正藏(2059)50.323上,325上,330下。

^② 见拙作 Mak, Bill M.,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t Astral Science from India to East Asia: The Central Asian Connection”, *Historia Scientiarum* 24 (2), 2015: 59-75.

供了近千年的文献材料和珍贵的历史佐证。其中天文学的内容显示出印度天文学整体的动态面貌,并同时透视着希腊元素逐渐融入印度天文学的整个过程。

除了年月日等一般的时间概念,还有一些没有明显科学含义、约定俗成的时间单位。比如罗马人沿用到4世纪初的八日“集市期”(Nundinal cycle),还有汉地以十日为旬。月相把朔望月一分为四,而“旬”则把三十日的历月一分为三,特别是后者以“十”作为单位,在东亚地区普遍使用。至于七日一周的周期,实际上跟历月和朔望月扯不上关系。事实上,七曜日或七日一周的概念,主要是基于星占的考虑。纽格鲍尔(Neugebauer)在其重要著作《古代精密科学史》中便指出,星期里七曜的排序取决于以下两个条件:(一)“土木火日金水月”等七曜,按运动速度,由慢至快排列(与托勒密地心说的行星周期等同);(二)将以上七曜的顺序,跟一日二十四小时配比,然后再把每一天的第一曜定为那一天的主宰神。而一日一曜,特别是一曜一时的概念来自埃及,尽管没有天文意义,却成了我们星期概念的基础(表1)^①。此外,我们亦可看出原来的星期从土曜(周六)开始,星期日和星期一作为一周之首的说法都是后来发展出来的。

表1 七曜的排序

小时/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第1	土	日	月	火	水	木	金
第2	木	金	土	日	月	火	水
第3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月
第4	日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第5	金	土	日	月	火	水	木
第6	水	木	金	土	日	月	火
第7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							

^① Neugebauer, O., *The Exact Sciences in Antiquity*, 2nd ed (unabridged and corrected), New York: Dover, 1969, pp. 168-170.

(续表)

小时/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第21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第22	土	日	月	火	水	木	金
第23	木	金	土	日	月	火	水
第24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月

印度的古吠陀文献,对行星和七曜的概念并没有作任何清晰的记述^①。“曜”梵语作 graha,直译为“执”,原指各种干预世界的恶灵,并没有指定的天文含义。公元初起,作为天体的七曜和后来的八曜、九曜在印度各种文献中陆续出现,无疑是新的发展。像《夜嚩那占命书》(Yavana-jātaka)等著作(图1),明显受了希腊天学影响^②。就现存材料来看,尽管传播途径和年代尚不能完全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到了公元5世纪,即阿黎耶婆多(Āryabhaṭa, 476—550)之时,以“日”为首的七曜日概念在印度本土已经植根^③。无论如何,曜日梵语作 vāra,意为“转”,具有周而复始的星占和宗教含义,而非实际的时间单位^④。至于印度星占系统中常见的九曜(navagraha),一般排序为七曜(saptagraha)加上罗睺(rāhu)、计都(ketu)两个假想天体组成。印度

^① 行星现象甚为显著,吠陀的诸作者没有理由观察不到,不过诸如《吠陀支天文》(Vedāṅgajyotiṣa)等重要著作,对行星却只字不提,其历法只涉及日、月和宿(nakṣatra)。

^② 有关七曜日的记载和说明,见 Yavana-jātaka 79. 52 - 54. Pingree, David, *The Yavana-jātaka of Sphujidhvaja*.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Vol. 4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Vol. I, p. 3. 有关本著作的年代问题,见拙作 Mak, Bill M., “The Date and Nature of Sphujidhvaja’s Yavana-jātaka Reconsidered in the Light of some 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 *History of Science in South Asia* 1 (2013): 11-14. 有关希腊裔印度天文学家的文化背景,见 Halbfass, Wilhelm, *India and Europe: An Essay in Understanding*,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88, p. 176. “Yavana”一词在后来的印度古文献中有不同的含义,指的不一定是希腊人,详见 Meile, Pierre, “Les Yavanas dans l’Inde tamoule”, *Journal Asiatique* 232, 1940, pp. 85-123. 汉文“奥那”一词见于《善见律毗婆沙》(大正藏 1462 号),为巴利文 yona 的汉译,与梵文 yavana 同,两者均源自希腊文 Ἰων(一说经古波斯语 yauna),原指古希腊爱奥尼亚一族或希腊东部族群,泛指希腊人。

^③ 阿黎耶婆多在其著作中说明七曜日排序的规则,但没有说明二十四时的关键元素: Saptāite horeśāḥ śanaīscarādya yathākramam śigrāḥ | śighrakramāc caturthā bhavanti sūryodayād dinapāḥ || (Āryabhaṭīya III. 16)。

^④ “曜日”后来成为传统印度《五支历》(pañcāṅga)的其中一支,为一般“历日”的标记。传统印度历以“朔望日”tithi 为计算基础(即朔望月等分三十),而“曜日”以“历日”为基础,反映两种不同思维的结合。值得注意的是古印度并无七日一周作为时间单位的概念。

和其他地域一样,只有七日一周,没有九日一周,可见七曜日先传入印度,后来才发展为八曜和九曜。作为一个组合,印度的七曜跟中国的七政、七纬或七曜的概念相似,但两者排序不同^①,特别是前者以日为首的七曜日的概念,在现存古典梵文文献中均被视作常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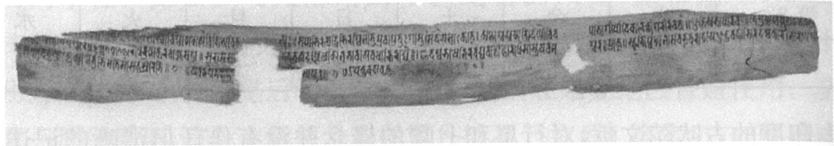


图1 《夜嚩那占命书》(Yavana-jātaka) 贝叶经 1/1180 (NGMPP A31/16), 现存尼泊尔国家历史档案馆 (Nepal National Archive), 写本年代约 13 世纪, 内容最早可能为公元后若干世纪, 作品最后一章包括对七曜日的说明。

二、东亚地区的七曜和星期

早期佛经,像《阿含经》等,对七曜并没有任何记载。由于吠陀文献同样也没有记载,可以肯定印度七曜的概念是后来才发展出来的。汉译佛典中,七曜和九曜最初见于《摩登伽经》(Śāradūlakarṇāvadāna)。此经为印度僧人竺律炎与大月支国后裔,汉地佛教居士支谦共译,年代最早相信为 3 世纪中叶^②。

今当为汝复说七曜。日,月,荧惑,岁星,镇星,太白,辰星,是名为七。罗睺,彗星。通则为九。如是等名。占星等事,汝宜应当深谛观察。^③

九曜在同时代的西方著作中并没有任何记载,相信源于印度或近东^④。其中罗睺在印度自古以来被视为引起日食的恶魔,在吠陀和《往世书》等传统文献中以不同称谓出现。佛典中恶魔以阿修罗(asura)形象出现,遮蔽日

月^①,实与前者同出一辙^②。至于《摩登伽经》把计都译为“彗星”,理解与公元 6 世纪的印度天文学家凡罗呵米希罗(Varāhamihira)一致^③。

6 世纪晚期以前,汉语佛教文献中诸曜次序不一。到了 8 世纪,才逐渐统一起来,反映出作者或译者在意识上对七曜日概念的一种转变。异域星学的流行,到了唐代达到顶峰,其中以《宿曜经》最具代表性。这部经大概为不空于玄宗末年所作(梵本阙),今传两卷,分别为他两位弟子史瑶与杨景风于乾元二年(759)和广德二年(764)所编纂^④。《宿曜经》是一部印度星占学的纲要著作,其部分内容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巴比伦与希腊。经文最后部分《算曜直章》提供了七曜日的算法,与印度的“日算法”(ahargaṇa)相同^⑤。

杨景风编纂《宿曜经》还提及当时在中国流行的三个印度天文学派: 鸠摩罗氏(Kumāra)、迦叶氏(Kāśyapa)和瞿昙氏(Gautama)^⑥。我们从正史记载知道,其中瞿昙氏成就尤其显赫。自瞿昙罗始,瞿昙氏三代均在朝中司天台担当要任,经历高宗、武则天、中宗、玄宗、肃宗五朝(665—776),长达百年之久^⑦。瞿昙悉达于开元六年(718)奉敕编撰《九执历》,其中“九执”意思就是“九曜”。尽管现存《九执历》并没提到“九曜”,但其整体内容跟当时印度流行的,像婆罗门笈多(Brahmagupta)著《糖饼天文书》(Khaṇḍakhādya)等小型天文专著接近^⑧,其中所记载的正弦表亦源自印度^⑨。

从上例可见,印度,特别是佛教,在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了

① 《杂阿含经》,大正藏(583)2. 99. 155/(100)436. 167。

② 有关印度七曜和九曜的分析,见 Dikshit, S. B., *Bhāratiya Jyotiṣh Śāstra (History of Indian Astronomy)*, New Delhi: Director General of Meteorology, 1968, pp. 58-63。

③ 后来印度和汉地天文学家一般给计都赋予天文学的定义(月降交点和月远地点)。有关后来在汉地传播的十一曜(即下文的“七政四余”),见钮卫星:《从“罗、计”到“四余”: 外来天文概念汉化之一例》,《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6 期,第 48—57 页。

④ 现存大藏经均以上下卷合为一经,史瑶所撰下卷为先,杨景风所撰上卷位后。高丽(大正)以及宋、明等大陆版多有阙失。现存日本写本和“觉胜版”最为接近原貌。见矢野道雄:《密教占星术》,第 7—12 页。

⑤ 《宿曜经》文中提及《算曜直章》,但具体内容仅存于日本写本,汉地诸版本均无记载。见矢野道雄:《密教占星术》,第 113—123 页。

⑥ 有关“天竺三家”,见江晓原:《天学真原》,第 297—304 页。

⑦ 陈久金:《瞿昙悉达和他的天文工作》,《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 年第 4 期,第 321—327 页。

⑧ 《糖饼天文书》为 7 世纪婆罗门笈多著作,分上下篇,内容精简,故取名“糖饼”。近年京都大学博士生吕鹏从事相关研究。

⑨ 正弦表概念源自希腊,不过《九执历》的正弦表保留了 Āryabhaṭa 著作中的正弦表的同样误差,由此可见其中的关联。见 Hayashi, Takao, “Āryabhaṭa's Rule and Table for Sine-Differences”, *Historica Mathematica* 24, 1997, pp. 396-406。

① 汉地七政并没有固定顺序,但也有“日月五星”(日月木火土金水)等惯例。

② 一说 5 世纪中叶后,见林屋友次郎:《異譯經類の研究》; Giebel, Rolf, “The Maṅgala Sūtra”, *Esoteric Texts*, Moraga, Calif.: Bukkyō Dendō Kyōkai America, 2015, p. 31。

③ 大正藏(1300)21. 405 中。

④ 详见 Hartner, Willy, “The Pseudoplanetary Nodes of the Moon's Orbit in Hindu and Islamic Iconographies”, *Ars Islamica* 5(2), 1938, pp. 113-154。

中介的作用。史瑶编的《宿曜经》便有以下记述^①：

夫七曜者，所谓日月五星，下直人间。一日一易，七日周而复始。其所用，用各于事，有宜者不宜者，请细详用之。忽不记得，但当问胡及波斯，并五天竺人总知。尼乾子末摩尼，常以密日持斋。亦事此日为大日。此等事持不忘。故今列诸国人呼七曜如后。

由此可见，曜日的概念不单在佛教，更在不同民族和宗教背景的圈子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非汉族居民聚居的长安里，“异域天学”得到传播，但当时汉人并不十分熟悉。上述引文接着以胡语（即粟特语）、波斯语和梵语三语列出曜日的称谓（图2，表2），说明当地的摩尼教、景教、祆教和佛教各有自己七曜日的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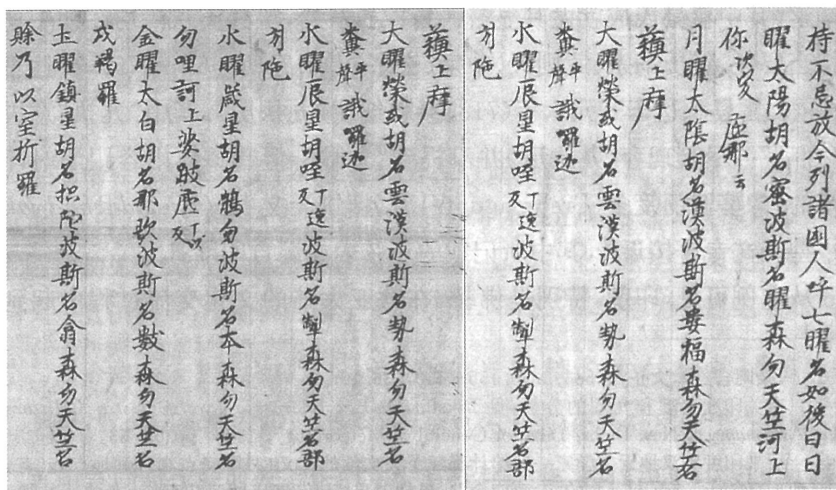


图2 史瑶编《宿曜经》卷下（七寺写本）

表2 《宿曜经》中以胡语、波斯语和梵语列出的曜日的称谓

	“胡名”Sogdian	波斯名 Pahlavi	天竺名 Sanskrit
日曜太阳	蜜 myr	曜(森勿)ew	阿儂底耶 aditya
月曜太阴	莫 m'x	娑祸(森勿)dō	苏摩 soma

① 大正藏(1299)21.398上。

(续表)

	“胡名”Sogdian	波斯名 Pahlavi	天竺名 Sanskrit
火曜荧惑	云汉(>漠)wnx'n	势(森勿)sē	盎哦啰迦 aṅāraka
水曜辰星	啞 tyr	掣(森勿)čahār	部陀 budha
木曜岁星	鹞勿斯 wrmzt	本(森勿)panj	勿哩诃婆跋底 bṛhaspati
金曜太白	那歌 n'xyδ	数(森勿)šaš	戌羯罗 śukra
土曜镇星	枳院 kyw'n	翕(森勿)haft	除乃以室折啰 śanaścara

印度的佛教僧侣把七曜的概念带到了中国，最后在日本兴盛，在日本的影响要比在中国深远得多。空海大同元年(806)把密教带到日本，同时带去的还有不空《宿曜经》《七曜攘灾诀》和《聿斯经》等密教天文著作。后来佛教“宿曜道”崛起，在平安时代一直发展，与儒、道背景的“阴阳道”针锋相对^①。藤原道长的《具注历》中，长德四年(998)一些日子标上“蜜”字，指的就是上文《宿曜经》胡语的日曜日^②。七曜日的概念在日本的密宗佛典中一直保存着，尽管宿曜道在镰仓时代后式微，但到了明治维新时又与西方星期概念重新结合，成为现代日语中的一部分而得到广泛接纳。

相比之下，七曜在中国一直没有流行起来，留下的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迹，记载在一些零星的佛经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星占著作中而已^③。事实上，印度佛教自北宋起在汉地一直没落，随后回回天文学家和耶稣会教士亦不断尝试引入七曜和星期的概念，不过没有得到广泛接受。直到20世纪初，随着传统思维和传统社会的世界观彻底瓦解与中国社会的全面西化，一周七日和星期的概念才获得了普遍接受。

三、黄道十二宫与天宫图算命术

生辰星占术源自巴比伦，进入了希腊文化圈后得到发展，是结合天文

① 矢野道雄：《密教占星术》，第62页。

② 同上书，第122页。

③ Wylie, Alexander, “On the Knowledge of a Weekly Sabbath in China”, *Chinese Researches*, Shanghai: s. n., 1897, p. 87.

(七曜运动)和星占的一套庞大的知识系统^①。公元后若干世纪传入印度,与本土星占学结合,直到公元6世纪渐趋成熟。现存汉文资料中有关黄道十二宫最早的记载,出自《大集经》中的《日藏分》和《月藏分》两品。学界一般认为两者为那连提耶舍(Narendrayaśas)于6世纪中叶译出^②。那连提耶舍的翻译与后来译法差别颇大(表3),经文对天宫图算命术也没有具体说明,这反映了作为星占用的“十二宫”的概念在汉地尚为陌生。到了唐代,《宿曜经》首次为汉地读者具体介绍了天宫图算命术。由于内容艰涩,史瑶翻译后,杨景风还要重译,可见“异域天学”在汉地传播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后来宋、元、明、清,各种西方星占著作被译为汉文,某种程度上都参照了汉译佛经的译法。

表3 黄道十二宫

符号	十二宫现代名 (英语)	梵语 (12 rāśis)	T397-14 日藏分 Sūryagarbha (十二神)	T397-15 月藏分 Candraagarbha (十二辰)	T1299 宿曜经 卷上 (十二宫)	T1191 文殊师利 根本仪轨经 (十二宫)
♈	白羊(Aries)	meṣa	持羊之神	弥沙	羊	羊
♉	金牛(Taurus)	vṛṣa	持牛之神	毗利沙	牛	牛
♊	双子(Gemini)	mithuna	双鸟之神	弥偷那	淫	阴阳/男女
♋	巨蟹(Cancer)	karkaṭa	蟹神	羯迦咤	蟹	蟹
♌	狮子(Leo)	siṃha	师子之神	纛呵	师子	师子
♍	处女(Virgo)	kanyā	天女之神	迦若	女	双女/童女
♎	天秤(Libra)	tulā	秤量之神	兜逻	秤	秤
♏	天蝎(Scorpio)	vṛścika	蝎神	毗梨支迦	蝎	蝎
♐	射手(Sagittarius)	dhanvin	射神	檀尼毗	弓	人马/弓马
♑	摩羯(Capricorn)	makara	磨羯之神	摩伽罗	磨羯	磨羯
♒	水瓶(Aquarius)	kumbha	水器之神	鸠槃	瓶	宝瓶
♓	双鱼(Pisces)	mina	天鱼之神	弥那	鱼	双鱼/鱼

① 江晓原:《天学真原》,第178页。

② 详见拙作 Mak, Bill M. (forthcoming), “Silk Road Transmission of Buddhist Astral Lore to China-Indian, Chinese and Central Asian Elements in the *Mahāsaṃpīpātasūtra* (T397)”.

早期通过佛教传入汉地的天宫图算命术,主要以当时流行于印度的星占系统为基础。译者对十二宫的形态的理解,从译文可见,并不一致。后来像宣化墓十二宫^①,流传日本的“星曼陀罗”“火罗图”^②和江户时代的《佛像图汇》(图3)等亦给我们提供了十二宫东渐的佐证。如西方的双子,初译为“双鸟”,后来依照印度传统译作淫/阴阳/男女,理解为一男一女。至于秤宫和瓶宫,后来均被译作物体,而非持有者,大概受梵语(*tulā/tulin, kumbha/kumbhin*)影响。“人马”弓宫情况也类似(*dhanu/dhanvin*),不过印度一般作持宫兽,即射手人马。差异最为显著的为“女宫”,唐末《聿斯经》和开宝七年(974)敦煌写本 P4071 出现了“双女”的译法(图4),日本宿曜道深受《聿斯》等藏外经影响,没有采用《宿曜经》中的“女”而采用了“双女”的译法(见图3)。在汉地,“双女”亦见于道教典籍和《明译天文书》等著作,与西方和印度一般的“处女”明显不同。由于莫高窟61窟和宣化墓(图5)和前面提到的《佛像图汇》一样,同样把“女宫”描绘为两个女子,说明“双女”的译法并不是出于偶然^③。以上例子说明天宫图算命术在东传的过程中出现了变异,其中哪些来自波斯,哪些来自中亚,出自景教徒还是摩尼教徒手中,难以一一说清。有意思的是,其中一些差异相信为个人翻译或绘图时的误解。以莫高窟61窟的“人马”为例(图6),画家大概把“人马”二字误拆为“人”和“马”,把人画在马旁边,很明显受了汉文影响^④。

除《宿曜经》外,上文提及的《聿斯经》相信是早期传入汉地的西方天宫图算命术的重要著作之一。学界一般认为《聿斯经》为景教徒传入,原文可能为古叙利亚文,明万民英嘉靖末年所撰《星学大成》载《西天聿斯经》一文,大概为前者的缩略版,其内容跟印度的生辰星占术差异颇大,很可能源于多

① 有关宋代以后的天宫图,见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第35—58页。另见 Sen, Tansen, “Astronomical Tomb Paintings from Xuanhua; *Maṇḍalas?*” *Ars Orientalis* 29 (1999): 29-54.

② 来自梵语 *horā*, 希腊文 *ὥρα*, 英译 horoscope, 即天宫图。现存有一行撰《梵天火罗九曜》一文。《大集经》梵文残片中亦见 *horā* 一词,唯汉文没有翻出,见 Mak 2015: 64-66.

③ “双女”中“双”可能来自天宫图星占术里十二宫中四宫为“双身宫”(希腊文 *δίσωμον*, 梵文 *dviśvabhāva*)的概念。见 Mak 2015: 68-69.

④ “人马”的译法见于《明译天文书》,由于从原文无法知晓其原来形象,译者大概深谙星占著作或见过西方或印度的半人半马图像。此外,《明译天文书》的译法可能参考了《聿斯经》,不过现存《西天聿斯经》并无人马一词,待确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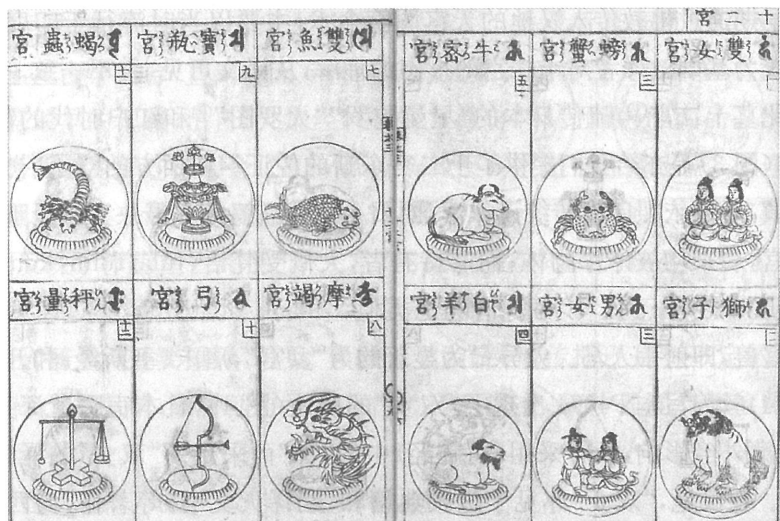


图3 江户时代《佛像图汇》的十二宫(笔者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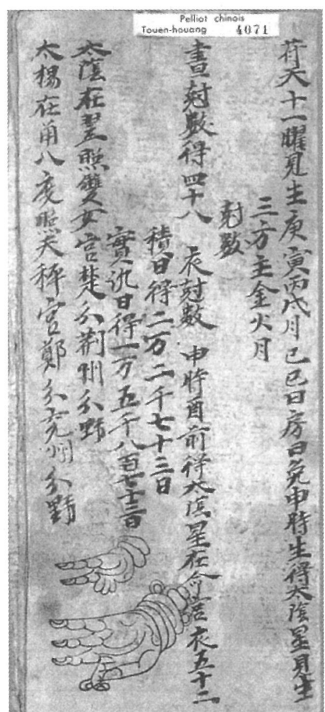


图4 敦煌写本 P4071(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中的“双女”



图5 莫高窟 61 窟(西夏, 11 世纪?)的“双女”



图6 莫高窟 61 窟(西夏, 11 世纪?)的“人马”

罗提乌斯(Dorotheus)所撰的《五卷》星占著作^①。《五卷》流行于远东地区,与哲学内容丰富的托勒密的《占星四书》(Tetrabiblos)相比^②,实用性较强^③。《聿斯经》于9世纪初随同《宿曜经》和《七曜攘灾诀》等星占著作传入日本。尽管内容不含佛教哲理,作者亦非佛教徒,但是作为藏外著作,《聿斯经》一直到镰仓时代末期为日本的密宗佛教徒所传,并成为日本宿曜经的基本经典之一^④,是天宫图星占术的基础参考书(图7)。

至于汉地的情况,与日本相比,“异域天学”仿佛昙花一现,并没有受到重视。上文提及的《宿曜经》,汉地的“大陆版”随着年代增长越趋本地化,原来印度的二十七宿逐渐改为二十八宿,“月宿傍通历”亦改为“大唐月建图”,

① 见拙作 Mak, Bill M., “Yusi Jing — A Treatise of ‘Western’ Astral Science in Chinese and Its Versified Version Xitian yusi jing.” SCIAMVS 15, 2014, pp. 105–169.

② 荻内清认为《聿斯四门经》中的“四门”指《占星四书》中的四章书,《中国中世科学技术史の研究》,东京:角川书店,1963年。近年笔者发现《西天聿斯经》包含了多处《占星四书》没有的内容,因此推测《聿斯经》的原本并非《占星四书》,见拙著,同上,第128—130页。

③ 拙著,同上。《五卷》本来没有名目,希腊文一般作 πεντάτευχος (pentateuch),拉丁文一般作 Carmen astrologicum,即“星占歌”,现存阿拉伯文译本和希腊文佚文,见平格里校订本和英译 Pingree, David, Dorothei Sidonii Carmen Astrologicum. Leipzig: Teubner, 1976.

④ Nakayama, Shigeru, A History of Japanese Astronom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60–62; 矢野道雄:《密教占星术》,第136—140页; Mak 2014: 114–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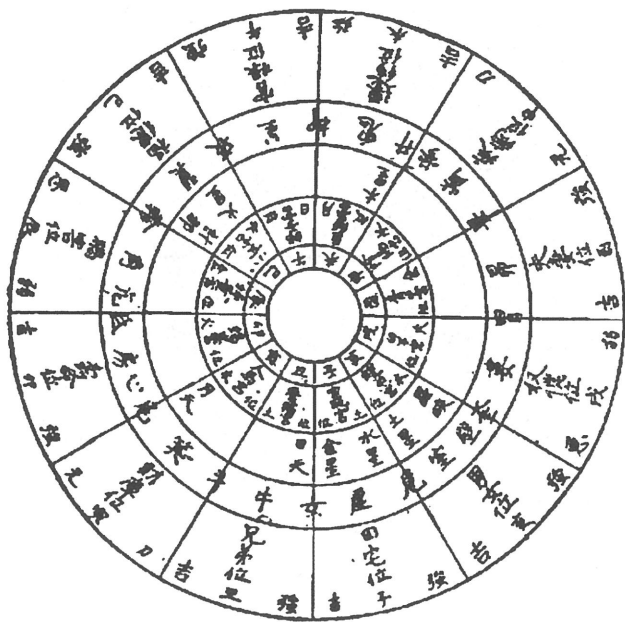


图7 天永三年(1113)九曜天宫图(《续群书类从》卷908, 埤保己一编, 1974年)

曜日算法亦已失传。《聿斯经》则原文佚失,但其占术为民间布衣所传,最后发展出《星学大成》等作品,其中的天宫图基本保存了原来黄道十二宫的格局,并融入了十一曜和其他本土元素(图8)。李约瑟认为这种“中国式天宫图”源自希腊^①,不过江晓原指出,中国的“天宫图”并没有具体的天文内容,其中星宫和各种“类天体”的位置完全是从八字推算出来,跟真实的行度“完全是两码事”^②。事实上,李约瑟所指的,像《郑氏星案》等天宫图,应用的占星术与《聿斯经》相同,其中的“七政四余”都是有行度的,只是配上了二十八宿和其他像星宫等本土元素。“七政四余”行度的推算,自明大统历起被吸纳为传统历法一环^③,撇开“四余”假想天体的天文意义先不谈,“中国式天宫图”实在是与希腊的“天宫图星占术”一脉相承。江氏所说的中国算命术,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第379页。

② 江晓原:《天学真原》,第182页。

③ 黄一农:《清前期对“四余”定义及存废的争执(上)》,《自然科学史研究》1993年第12(3)期,第224页;《清前期对“四余”定义及存废的争执(下)》,《自然科学史研究》1993年第12(4)期,第349页。

的确属于另一个系统。比如《正统道藏》的《紫微斗数》(图9),宫位格局和“聿斯”系统的天宫图相同,明显受了后者影响^①,不过星体的排布并没有天文意义,只取原来天宫图之形而失其实义。严格来说,这一类的星占术已经不再属于希腊星占系统,是汉地生辰八字算命术的扩充。可以这样说,《郑氏星案》和《紫微斗数》同样是希腊和中国文明交汇的产物,前者为中国化的希腊星占学,后者为希腊化的中国算命学。



图8 《星学大成》中的天宫图(十二宫符号为作者附加)

事实上,像《聿斯经》《星学大成》和《郑氏星案》等中国化希腊天宫图星占术,很早就已经失传了,唯有《紫微斗数》尚在传统华人社区广为流传。至于具有天文含义的“七曜推步”和“十一曜推步”至今仍然见于民间黄历(通胜)(图10),而原来相关的黄道十二宫和天宫图则无迹可寻。

① 何丙郁指出《道藏正统》紫微斗数的“十二位”名称跟《明译天文书》的最为接近,并认为明代首次以“紫微”一词命名中国化的希腊星占术。Ho 2003: 74-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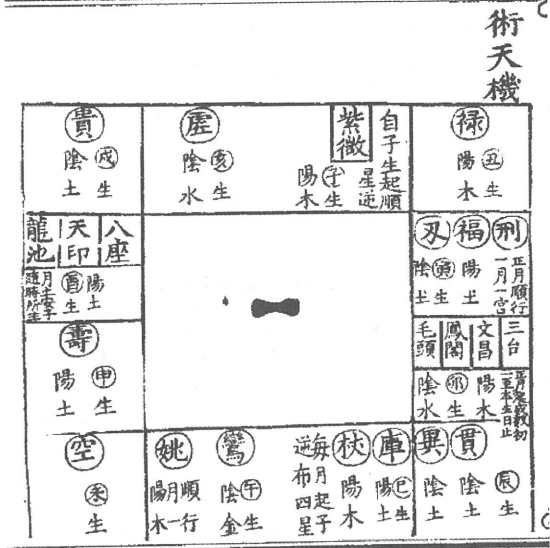


图9 《正统道藏》《紫微斗数》卷一第十

图10 现代“通胜”(民间黄历)中的四余行度

四、总结

古代中国与日本的“异域天学”，早期主要通过佛教徒和佛经翻译得到传播和发展，在中印历史交流过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而“天学”本身是从不同文化长时间交流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尽管其发源地可以追溯到巴比伦和希腊，但由于在传播过程中吸收了埃及、印度和中亚等不同的本地元素，所以在不同的地域和时代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七曜日等概念牵涉宗教和日常生活的规律，而不同的星占术则与个人甚至国家命运相连。这些异域知识，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接受还是拒绝，往往取决于个别地域的文化因素和背景。对比中国与日本两地的“异域天学”，就会发现两种不同的传播和吸纳模式。

“异域天学”在汉地不同时代引起知识分子的好奇和关注，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得到广泛接纳。西方七曜日的概念在汉地直到20世纪初随着政治和文化气候的巨变终于冲破文化关口而获得接受。至于天宫图算命术则被本土化，尽管貌似天宫图，实质上是本土术数的扩充。原来的天宫图算命术，由于缺乏文化根基和宗教的支持，一直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与中国相比，日本传统思维的张力较弱，对待“异域天学”的手法比较单一。佛教在日本兴起，有带动当地文化的作用，像七曜日等传统概念一直在日本社会中酝酿着，明治维新后又得到更新，并与现代的星期概念结合起来。而天宫图算命术等“异域天学”，则继续依附着佛教，以“密教占星术”之名得以保存。



复旦中华文明研究专刊

中印关系研究的视野与前景

沈丹森 孙英刚 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话、讨论的方式作沟通与融合。无论如何,海外汉学家早已成为与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华人学者同样重要的研究群体,他们对于中华文明也有着独到的理解。“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本土学者加以重视,全单照收和简单排斥都是要不得的极端态度。

四百年前,明末“西学”翻译运动先驱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我们把明末的这句格言引申出来,作为中外学术交流中的“金科玉律”。中西方学者之间相互借鉴,即了解对方工作的真实意义和真正主张。立场不同,可阐发双方优长之学;视角各异,可兼收领域互补之效;观点针芒,实可在讨论之后达成更加充分的会通和融合。四百年来,明、清、民国的经学家、国学家,一直和欧美的传教士、外交官和“中国通”切磋学问,现代中国的儒学、佛学和道学,无一不是在与利玛窦、艾儒略、林乐知、李提摩太、李佳白、费正清、李约瑟等欧美学者的对话交流中,经过复杂的交互影响而形成的。离开了“西学”(Western Learning)和“汉学”(Sinology)的大背景,从徐光启、阮元的“新学”,到康有为、章太炎的“国学”,都不可理解。我们相信,学术领域此疆彼界的畛域之分,既不合理,也无可能。海外汉学(中国学)与中国本土学术并不冲突,所谓的主客之争,那种有你没我的势不两立,完全没有必要。

有鉴于此,ICSCC设立专项资金,面向海外,每年邀请国外优秀中青年学者访问复旦大学,与本校、上海地区以及全国各地的同行学者们充分交流。通过学术报告、小型工作坊、论文集和学术专著的编译出版等,构建访问学者与国内学者的全方位、多层次交流体系,促进海外汉学家与中国本土学者之间的互动。中心邀请来访的海外学者与中国学者合作,将他们主持的工作坊论文,经过作者本人的修改、增订,或由编者整理、翻译,结集出版,即为“复旦中华文明研究专刊”系列。我们希望藉此工作,展现中外学者精诚合作的成果,以饗学界。

目录

1		导 言
13	徐文堪	关于印中语言接触史的一些问题
27	严耀中	印度宗教中声音的作用及在华土之影响
43	周伯戡	从边国到中土:佛教中心由印度到中国转移的一种解释
65	宁梵夫	重估“边地情结”:汉传佛教中对印度的逐渐容受
77	陈 明	一角仙人故事的文本、图像与文化交流
123	孙英刚	大雁塔为什么叫“雁塔”
136	麦文彪	古代中国与日本的“异域天学”:七曜日与天宫图星占术
152	李 辉	《大方等大集经》中的“二十八宿直日术”复原

167	杨 斌	清迈法典、海贝和亚洲的文明交流
182	刘 震 陈怀宇	《象腋经》经名考
191	段玉明	“西方”的漂移 ——以元代来华的印度高僧指空为例
203	王启元	明代文学想象中的印度
221	马达维· 塔姆皮	殖民地时期印度—中国之间的关系研究
230	徐启轩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胡愈之对印度反殖民运动认知迭 变初探
242	沈丹森	20 世纪初期的泛亚洲主义及印度—中国的互动
275	郁龙余	谭云山：殖民时期中印关系的伟大智者
294		作者简介

导 言

何谓中印研究？

中印研究领域从未有过界定。一个原因是这个领域在大专院校内仍未有明确的课程规划；另一个原因则是可融入此领域的学术内容太多太广，难以梳理。有关印度与中国之间在历史上和当代的互动，以及两国比较研究的著述，或许最容易被划入中印研究的范畴内。这两类研究可包含若干子类，如探讨佛教流播与影响、两国历史上的商业往来或当代经济关系，或比较国家形成、战略政策及其他方面的研究。一些分析将重点放在双边关系与比较上，另一些则把中印关系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区域或全球框架内进行讨论。另外，还有印度人和中国人的相互描述，如行记、评论、译文甚至网络帖子，这些材料均为中印关系提供了重要见解。

以上三个类别或可初步勾勒出中印研究的轮廓，也有助于划分中印问题研究与著述从 19 世纪演变至今所经历的四大阶段。这四个阶段分别是：萌芽阶段（19 世纪）、泛亚洲主义阶段（1901—1961）、冲突阶段（1962—1988）、中印大同阶段（1988 年至今）。以下将谈到，中印研究在很多方面受到当时地缘政治和双边关系的影响。一方面，19 世纪的史料翻译主要由欧洲汉学家展开，与欧洲帝国主义延伸至亚洲有密切关系，而亚洲学者在泛亚洲主义阶段推动的新一波学术研究，则是对欧洲殖民主义在亚洲扩张的一种回应。另一方面，学者在后两个阶段发表的著作，则明显受中印关系恶化及其后两国经济崛起所影响。



复旦中华文明研究专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印关系研究的视野与前景/沈丹森、孙英刚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7
(复旦中华文明研究专刊)
ISBN 978-7-309-12323-4

I. 中… II. ①沈…②孙… III. 中印关系-研究 IV. D822.3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8442 号

中印关系研究的视野与前景

沈丹森 孙英刚 编
责任编辑/史立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8.75 字数 274 千
201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2323-4/D·823
定价: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神圣空间:

中古宗教中的空间因素

陈金华 孙英刚 编

中国近世地方社会中的宗教与国家

王 岗 李天纲 编

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

——以教科书为中心

张仲民 章 可 编

旅行的图像与文本:

现代华语语境中的媒介互动

吴盛青 编

中印关系研究的视野与前景

沈丹森 孙英刚 编

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两次复兴

汲 喆 田水晶 王启元 编

丛书统筹 章 可
责任编辑 史立丽
装帧设计 马晓霞